

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

——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

杨菊华 李路路

提要: 文章使用 2006 年东亚社会调查的家庭主题调查, 构建了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与代际互动的理论分析框架, 比较、分析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家庭凝聚力的现状、特点及相关因素的异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首先, 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的衰落, 代际之间在日常照料、经济支持、情感慰藉等方面依然存在密切的互动。这些互惠行为反复且经常发生, 当亲子的空间距离邻近时更是如此; 其次, 东亚四地在家庭凝聚力方面表现出巨大差异, 在不同维度的凝聚力方面也展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 家庭凝聚力在韩国保存最强, 台湾地区次之, 中国大陆再次, 日本最弱。这些有悖于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发现也许是尚在进行的、与现代化相抗衡的维系家庭传统的斗争, 而这种斗争也许正是延续代际同住、情感联络、实际支持的强大社会压力的折射, 致使在社会变革和家庭变迁面前, 亲子之间的资源依赖与互补成功地延续着传统的家庭团结力量。可见, 家庭凝聚力具有强大的抗逆力性和适应性, 深厚的文化积淀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

关键词: 现代化 家庭凝聚力 亲子同住 情感联络 代际支持

东亚国家和地区一直以强固的家庭凝聚力而著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至少一个孩子(尤其是儿子)与父母居住, 照顾他们的老年生活(Unger, 1993; Whyte & Parish, 1984)。代际关系是双向互惠的; 老者是家庭的中心, 家庭伦理强调父慈子孝、尊老爱幼。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 东亚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变迁。人口转变与工业化、都市化、家庭政策的推行等多方面因素一起, 缩小了家庭规模, 重构了家庭成分, 改变了家庭环境, 再塑了代际关系。比如, 中国大陆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大约四分之一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四分之一的家庭有女无儿。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家庭规模也由于生育率的急速下降而大大缩小。

* 本研究得到日本住友财团(Sumitomo Foundation)“Family Change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What Can China Learn from Japan”项目(No.078066)的资助。

家庭现代化理论预测,随着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扩展的亲属关系纽带将被弱化、传统的家庭形式将变得更为松散,核心家庭将成为独立的亲属单位,这些变化必然导致代际(尤其是亲子)之间凝聚力的相应削弱(Goode, 1963)。

而我们的问题是: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东亚社会?随着现代化变迁的进程,东亚社会的家庭凝聚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本文使用2006年东亚社会调查(East Asian Social Survey, EASS)的家庭主题调查数据,^①比较、分析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及台湾等三国四地家庭凝聚力(family solidarity)的现状、特点及相关因素的异同,试图回答下面三个相关问题:

第一,东亚社会的家庭凝聚力是否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被削弱?抑或有很强的抗拒力,原因何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难以直接回答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对东亚四地家庭凝聚力的影响,但是,东亚四地的家庭调查数据提供了一种可能,因为它们的现代化程度不同——日本最高、韩国和台湾地区次之、中国大陆最低——因此可以将它们近似地看作是一个现代化的发展序列,进而可以近似地检验现代化对家庭凝聚力的影响。按照传统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推断,在这四个地区中,由于日本的现代化程度最高、中国大陆的最低,人们有理由假定,日本的家庭凝聚力最弱、中国的最强。

第二,在这四个东亚社会,家庭凝聚力更多地表现出一致性还是差异性?一方面,鉴于东亚三国四地享有类似的人口转变模式及强调代际互惠的文化背景(如:儒家文化体系),它们的家庭凝聚力可能展示类似的特点,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另一方面,鉴于它们在人口转变和家庭变迁的起始时间、进程、阶段以及社会支持体系、都市化程度等方面的异质性,各地家庭凝聚力的模式和相关因素或许存在较大差异。

第三,家庭凝聚力通过家庭形式和居住模式、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

① “东亚社会调查”是由中国大陆、韩国、日本、台湾等三国四地共同合作、每两年进行一次的代表性和兼容性的综合社会调查,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韩国的成均馆大学(Sungkyunkwan University)、日本的大阪商业大学(Osaka University of Commerce)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具体负责、实施。该调查基于各地的General Social Survey,但EASS使用统一的、标准化的问卷,旨在比较拥有儒家文化背景、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三国四地在家庭、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异同及其对社会、家庭、个体福利的影响。该调查始于2006年,每期调查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2006年的主题为“东亚社会家庭调查”。

交流及物质往来等多种形式(或维度)表现出来。本文同时关注这三个维度,并探讨不同维度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哪个维度受到更大的冲击,哪个维度具有较强的抗逆力而得以延续,从而更深入地揭示现代化进程与家庭凝聚力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表明,都市化的发展和家庭观念的变迁等会改变亲子之间的居住模式,拉大亲子间的距离,但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亲子情感交流和除日常照料外的物质往来的便利性,使代际资源具有相互依赖、互补互惠的特点(王跃生, 2006; Milagros et al., 1995; Morgan & Hiroshima, 1983; Pimentel & Liu, 2004; Thornton & Fricke, 1987)。

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补充和发展现有研究:

其一,立足东亚。该地区是近年来世界上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同时家庭变化最活跃之地,因此,也是探讨社会经济转型、人口转变对家庭影响的最适宜之地。

其二,聚焦家庭。在中国,家庭研究并未引起学界和政府足够的关注,因为与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如:经济发展、社会分层)相比,家庭被认为是次重要的。除少数家庭学者外,家庭问题一直被当成“私人”问题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跨国或跨地区研究更是十分罕见。然而,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所谓家庭问题其实具有明确的公共意义,它可以影响家庭成员多方面的福利水平、家庭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并最终影响家庭的和谐与稳定(Li, 2004; McDonald, 2000; Wilkie et al., 1998; Xu & Lai, 2004)。

其三,比较视角。我们使用2006年东亚社会调查的家庭主题调查数据,某种程度上将填补东亚地区家庭凝聚力比较研究的空白。据作者了解,由于缺乏兼容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无大陆、日本、韩国及台湾四地的家庭比较研究。2006年东亚家庭调查提供了时间最近、内容兼容且具有可比性和代表性的大型社会调查数据,使多地区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简述东亚家庭凝聚力的背景及处于转型时期或转型后的家庭变化;在此基础上,构建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与家庭凝聚力关联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介绍数据的特点、描述数据的特征、陈述数据的分析结果;最后,对分析结果进行总结、解释和讨论,并探讨家庭凝聚力的延续和变迁对家庭功能、公共政策的启示。

一、社会变迁与家庭凝聚力

(一) 家庭凝聚力及相关因素

基于亲缘关系(affinity)、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家庭功能(function)等三种潜在机制,代际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可以被区分为五大类型:紧密型(tight-knit)、社交型(sociable)、亲密有间型(intimate but distant)、责任义务型(obligatory)和疏离型(detached)等(Silverstein et al., 1997)。一个家庭的亲子关系遵循哪种模式,既受制于家庭凝聚力,同时也影响家庭凝聚力。家庭凝聚力包括三个中心维度,即:地缘邻近(即居住模式)、情感联络和代际支持。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比如,情感联络和实际支持(尤其是非经济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居住模式,而对情感和实际支持的愿望也会反作用于居住模式。

家庭(成年)成员(尤其是代际之间)的居住模式是家庭凝聚力的表现之一。在东亚社会,居住模式对家庭生活产生重要作用。从历史来看,中国大陆、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家庭户特征是,以大家庭居住为主,尤其是已婚儿子及其家庭和未婚孩子与父母同住(Unger, 1993; Whyte & Parish, 1984; Won & Lee, 1999)。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影响着家庭居住模式(Bian et al., 1998; Hirschman & Minh, 2002; Limanonda, 1991)。

从亲代视角来看,子女的数量和性别通过影响可能同住的成年子女的绝对数量、子女的家庭观念、家庭环境等,影响代际同住的普遍性(Hirschman & Minh, 2002)。例如,独生子女(尤其是没有其他兄弟的独生儿子)或许更可能与父母同住,因为(如果父母期望与子女同住的话)他们别无选择。然而,在生育率降低的环境下(东亚地区即是如此),由于儿子数量不足,父母与成年子女同住的比例也终将降低(Zhao, 2000)。同时,又有研究指出,死亡率的降低延长了父母的存活年限,提供了比过去更大的同住机会。年老时收入的减少和健康水平的降低也会促使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尤其是在公共支持不足或缺失的情况下。此外,配偶的亡故将增加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对丧偶的男性老者尤其如此:因为妻子依旧是家庭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一旦妻子亡故,其功能必须由他人替代(Pimentel & Liu, 2004)。不过,低下的经济地位也会增

加老年寡妇与子女居住的概率(Cooney & Shi, 1999; Ikels, 1993)。

从子女的视角来看, 他们的婚育情况会影响亲子之间的居住模式。年轻人群、新婚、新育夫妇或许需要父母的家务帮助和经济支持, 从而提高他们与父母同住的可能(Milagros et al., 1995; Morgan & Hiosima, 1983; Thornton & Fricke, 1987)。在 1982—2000 年间的中国大陆, 亲子同住模式一直比较稳定。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 中国三代家庭的比例占全部家庭的 29%, 而与父母同住的成年子女所占比例无疑更高(杨菊华, 2008)。在农村地区, 当父母与子女不同住时, 他们也往往相邻或同村居住。这既是儒家文化制度下的家庭伦理观念和家庭制度的延续, 也是现实经济和结构性制约的结果。研究发现, 代际互惠是中国 1982 年—2000 年间亲子同住习俗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之一(王跃生, 2006)。然而, 教育的扩张可能改变子女的家庭观念, 将他们从父母的掌控中解脱出来, 降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因此, 教育和经济发展通过消解传统、组建核心家庭的渴望而影响亲子居住模式(Hirschman & Minh, 2002), 而职业和地域流动(即从农业、农村向工业、城市的转化)更促成了年轻人的独立。研究表明, 在越南(Hirschman & Minh, 2002)、泰国(Limanonda, 1991)和中国大陆(Bian et al., 1998), 更高层次的教育水平、非农工作、城市居住等都增加独立居住的可能性, 降低亲子同住的概率。

情感联络即亲子之间面对面或其他形式的交流。同住或近地居住无疑促进亲子情感联络的频度, 并提供良好的亲子之间支持和服务的平台, 强化支持的可及性和可得性。在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过程中, 这个维度的家庭凝聚力在满足个体的情感慰藉等社会需求方面显得越发重要(Silverstein et al., 1997)。

在东亚三国四地, 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一直比较密切, 尤其是直系家庭成员之间更是如此。然而, 亲子交流的频度受制于地理距离、家庭观念、生理和结构因素(如: 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家庭形式等)。十几年前对中国的研究表明, 当时无论父母、子女居住何地, 亲子之间都能保持经常的联络(Davis-Friedman, 1991; Unger, 1993)。近年的一些社会调查数据却表明, 受访者与朋友联络的频度超过与父母等家庭成员的联络; 不过, 随着受访者年岁的增长, 子女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又随之增强了, 故年轻人与父母的疏离很可能只是暂时的年龄队列现象, 而非对父母的叛离(如“2000 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北京老

年人群支持调查”所显示的)。

代际支持是互惠的:父母支持子女、子女支持父母,二者均涉及经济和非经济交换。亲子之间直接的照料支持基本是居住模式和情感联络的功能函数。家庭结构的变化未必一定弱化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照料。在专业机构及其他公共老年照料和服务缺失或不足的社会情景下,家庭依旧是日常照料的主要单位(Landwerlin, 2001)。地理距离减弱亲子间日常生活照料、尤其是长期照料的便利性。但经济支持却不然,金钱支付可以跨越地缘的局限,在相隔千里的亲子间顺畅运作。事实上,在这几类家庭凝聚力中,经济支持可能是最不受家庭变迁影响的一个维度,甚至可能得到强化,因为不能亲自照料父母的子女(主要是儿子)更可能通过经济支持来补偿对父母照料的不足。研究表明,中国一半以上的城市老年人接受子女的资金资助——即便他们中的多数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并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陈皆明, 1998)。

在成年亲子关系中,尽管父母的需求比子女的需求对居住模式、代际支持的影响更大(Bian et al., 1998; Logan et al., 1998),但也有研究表明,子女对父母支持的需求也会影响到家庭凝聚力的具体表现,如父母帮助子女料理家务,照顾孙子女等,从而使东亚地区的亲子关系表现出明显的互助、互惠的特点(Martin, 1988)。一方面,收入较低的年轻人在形成婚姻、组建家庭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他们的父母正值盛年,建立了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可以在住房等方面给子女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帮助(Logan et al., 1998; Logan & Bian, 1999)。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大量的妇女(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结构性的制约及社会(或公共)支持的不足增加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使来自父母甚至祖父母的帮助越发重要(Chen et al., 2000; Davis, 1993, 2000)。即便年轻人为了维持独立、享受自由、保护隐私而更愿意自己居住,但现实因素使他们不得不选择与父母同住。由于父系继承制、从夫居制的缘故,家庭支持主要通过男性谱系来体现。但近些年来,双方父母参与亲子互动也越来越普遍和流行起来(Pimentel & Liu, 2004)。

(二)分析框架

由此可见,家庭现代化的理论不能很好地预测东亚地区家庭关系的变化。东亚社会亲子同住、频繁交流、相互支持等习俗的延续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特征的转变并不一定总是带来核心家庭的相应

增加(Thornton & Fricke, 1987), 同样, 也不一定会弱化家庭凝聚力。基于上述的研究成果, 在我们看来, 家庭凝聚力的状况和变化会受到下述四个因素的影响, 即: 国家和地区状况(包括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公共支持的需求和供给、家庭伦理观念和态度。首先,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同, 宏观的结构性差异导致: (1)人们拥有高低不同的教育程度、职业成就、收入水平; (2)亲子在进行交流、互动、支持时, 时间可得性和可及性存在差异。比如, 在中国大陆, 绝大多数成人从事全职工作, 而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 不少妇女在婚、育以后逐渐退出劳动市场, 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故其对祖父母提供家务帮助和孙子女照料的需求就不一样。其次, 三国四地的公共支持体系差异很大, 中国大陆在这个方面比较落后, 而日本却十分发达。这意味着, 公共领域对家庭的支持可能各不相同, 家庭对公共支持的需求也有差异。再次, 四地的家庭观念或有差别。中国大陆除经济发展程度较低、人口转变的进程与其他两个国家和台湾地区存在明显不同外, 还经历了独一无二的、旨在根除儒家家庭传统的文化大革命, 推行对人们生育行为产生巨大限制性影响的生育政策。四地不同的宏观政策、制度、结构及家庭环境、个体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或许重构了人们的家庭观念。现象之间的复杂性使同时考察多个指标的跨国、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既至关重要, 也十分必要。

因此, 尽管由于类似的文化渊源和人口转变模式, 东亚社会在上述四个方面享有共性, 但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 四地的家庭凝聚力或许展示出不同的现状、特点, 拥有不同的相关因素, 且它们之间的差别将表现在不同维度的家庭凝聚力方面。深入分析这些差异, 将有助于我们推进对于影响家庭凝聚力机制的认识。

以上理论思考和本文的分析框架, 可表示为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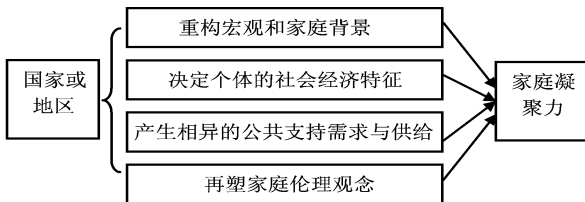


图 1 国家/地区因素与家庭凝聚力之间的潜在关联机制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使用 2006 年东亚社会调查的家庭主题调查数据,分析、探讨东亚三国四地家庭凝聚力的现状、模式、相关因素及在家庭凝聚力方面的异同。该调查收集了家庭、受访者、父母、配偶及子女的基本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本文的分析单位为家庭,数据分析是从成年子女(与父母关系)的视角进行的。由于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亲子关系,父母亲的可得性是必要条件,故分析样本仅限制为在调查时至少有一位父母尚在的受访者。若受访者的父母全部去世,我们代之以尚在的配偶的父母,并以配偶父母的特征取代缺失父母的特征。通过该选择标准,加上剔除其他变量有缺失的样本,共获得 5789 个家庭户样本。其中,2098 个家庭来自中国大陆,占总样本的 35.68%;1205 家庭(20.49%)来自日本;1139 家庭(19.37%)来自韩国;其余 1438 家庭(24.46%)来自台湾地区。

(一)变量

(1)因变量

本文使用六个分别代表三个维度的变量系统全面测量亲子之间的凝聚力。其一,亲子之间的居住模式用来测量家庭地缘凝聚力。该变量可以表现为两种衡量:(1)亲子同住,(2)亲子之间空间距离。由于同住很好且简洁地体现了家庭地缘凝聚力,本文将其作为第一个因变量。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被用作主要自变量之一(详见下文)。其二,情感联络的概念通过亲子交流的频度来实现,包括面对面的交流和其他形式的交流。该变量从下面的问题构建而来:“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经常进行面对面的联系与交流?”“父母与子女是否经常以其他形式进行联络?”该变量为连续衡量,取值从 1 到 8,取值越大,联络的次数越多。尽管面对面的交流要求地缘邻近,但其他形式的交流却无此要求。当然,遥远的距离可能意味着更高的交流成本,故亲子的地缘距离越远,他们的联络频度可能越低。其余四个变量——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子女对父母的照料支持、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父母对子女的照料支持——用来衡量代际实际支持。这些变量分别基于以下调查问题:“您是否经常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您是否经常给父母提供其他

支持?”“父母是否经常给您提供经济支持?”“父母是否经常给您提供其他支持?”这四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0代表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或极少提供支持,1包括有时提供支持、经常提供支持、总是提供支持。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测量可能不是最佳的——比如,情感联系的测量可能过于肤浅,不能反映亲子间深层次的交流和慰藉,但它们是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更好的测量。

(2)主要自变量

本文有两个主要自变量。其一,国家或地区。东亚三国四地为一组虚拟变量: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用于描述三国四地家庭凝聚力的现状和特点,并比较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四地在家庭凝聚力方面的异同。这将帮助我们回答文章的前两个研究问题。

其二,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历史上,居住模式是家庭凝聚力的基础和前提;如今的情形虽有差异(即现代化的进程缩短了地域之间的距离),但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依旧与情感联络和实际支持有关,因为它影响亲子往来的频度、互动互惠和支持的方便程度。无疑,地理上的邻近将促进代际往来、日常照料、经济转移支付,对前二者尤其如此。因此,为衡量家庭凝聚力维度之间的互动,这里使用亲子距离预测代际间的情感联络和实际支持。该变量包括四个分类:同住和邻居、步行15分钟内、开车60分钟内、更远。同时,我们控制家庭观念(比如,同住意愿、支持父母)对居住模式的反作用。

(3)控制变量

为了解主要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作用,本文控制受访者的年龄、社会经济特征、家庭观念及父母特征。它们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兄弟姐妹构成、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家庭态度(即是否愿意三代同住、子女是否应该支持父母),年轻父母的年龄、性别与婚姻状态的复合变量、健康水平等^①(变量的定义及单变量分析结果请参见表1)。现存研究发现,这些变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亲子间的居住模式、

^① 此外,本文还尝试在模型中包括父母的教育和职业,大约33%的受访者的父母尚在劳动市场。我们认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他们经济上的独立性越强,自给自足的能力越高,对子女支持的需求也越小,与子女联系的频度亦会有所不同。然而,分析结果显示,教育和职业均与因变量无显著关联,且对本文包括的其他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缺乏干扰或调节作用。出于简洁的目的,本文不包括这两个变量。

情感联系和(或)代际互惠支持。^①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使用的两个家庭态度变量: 如果受访者希望三代同住, 表明他们有很强的家庭导向, 故而更可能与父母同住; 同样, 如果他们认同支持父母的理念, 则他们更可能住在父母附近, 保持与父母的频繁联系, 实际上也更可能支持父母。由于居住模式与代际联系、实际支持之间存在内生性, 使用亲子空间距离预测亲子联络和代际支持可能导致双向因果关系问题。不过, 通过控制代际同住意愿、赡养父母观念等家庭态度变量可以避免该问题, 降低由于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可能给分析结果带来的偏误, 使分析结果更为可信。

数据分析采用 Stata 统计软件(10.0 版), 具体过程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进行描述性分析, 包括单变量(请参见表 1)和二元相关分析, 以了解变量的基本分布特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次进行模型分析, 探讨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独立关系, 评估三国四地在家庭凝聚力方面的异同, 回答前面提出的三个研究问题。由于因变量包括连续衡量和二分类衡量, 本文采用线性模型和 logistic 模型, 分别对这两类因变量进行模型分析。

表 1 变量的定义及单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比例/均值
因变量		
亲子同住	1= 亲子同住; 0= 其他	46. 41
情感联络	亲子情感联络频度	5. 98
亲子支持		
子-亲经济支持	1= 子女至少有时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 0= 其他	54. 35
子-亲其他支持	1= 子女至少有时给父母提供非经济支持; 0= 其他	57. 06
亲-子经济支持	1= 父母至少有时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0= 其他	36. 85
亲-子其他支持	1= 父母至少有时给子女提供非经济支持; 0= 其他	46. 82
主要自变量		
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1= 中国大陆家庭; 0= 其他	35. 68
日本	1= 日本家庭; 0= 其他	20. 49
韩国	1= 韩国家庭; 0= 其他	19. 37

①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本文报告的结果变量的测量方式外, 对于其中不少变量, 我们还尝试了数种其他的衡量方法。比如, 兄弟姐妹结构的其他测量途径包括兄弟姐妹数量以及姐妹数量、有姐妹无兄弟、有兄弟无姐妹的情况, 等等。但在反复检验后, 这里报告的测量方式既合适也最简洁。

续表 1

变量	定义	比例/均值
台湾地区	1= 台湾地区家庭; 0= 其他	24. 46
亲子空间距离		
同住或邻居	1= 同住或邻居; 0= 其他	30. 24
步行 15 分钟内	1= 步行 15 分钟内; 0= 其他	12. 33
开车一小时内	1= 开车一小时内; 0= 其他	17. 23
更远	1= 更远; 0= 其他	40. 20
控制变量		
<u>个体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u>		
<u>年龄</u>		
17-34 岁	1= 受访者年龄介于 17-34 岁; 0= 其他	41. 82
35-54 岁	1= 受访者年龄介于 35-54 岁; 0= 其他	49. 32
55 岁及以上	1= 受访者年龄超过 54 岁; 0= 其他	8. 86
女性	1= 女性; 0= 男性	53. 59
单身	1= 从未结过婚; 0= 其他	27. 09
独子	1= 受访者没有兄弟; 0= 其他	
兄弟数量	受访者的兄弟数量, 连续衡量	1. 31
<u>教育水平</u>		
小学及以下	1= 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 0= 其他	10. 53
初中	1= 初中教育程度; 0= 其他	41. 02
高中	1= 高中教育程度; 0= 其他	25. 22
大学及以上	1= 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 0= 其他	23. 23
<u>工作状况</u>		
全职	1= 全职; 0= 其他	48. 55
半职	1= 半职; 0= 其他	9. 22
自雇	1= 自雇; 0= 其他	15. 15
家务	1= 作家务; 0= 其他	10. 12
其他	1= 其他工作状况; 0= 例举情况	16. 96
<u>个体家庭观念与态度</u>		
希望三代同住	1= 希望三代同住; 0= 其他	62. 58
子女应该支持父母		
同意	1= 同意或十分赞同; 0= 其他	71. 82
无所谓	1= 无所谓; 0= 其他	18. 89
不同意	1= 不同意或很不同意; 0= 其他	9. 29
<u>父母特征</u>		
年龄	父母年龄, 连续衡量	64. 85
在世状况		64. 85
父母均在	1= 父母均在; 0= 其他	64. 83
父亲尚在	1= 父亲尚在; 0= 其他	6. 57
母亲尚在	1= 母亲尚在; 0= 其他	28. 60
健康较差	1= 身体很差或较差; 0= 其他	34. 42

数据来源: 2006 East Asian General Survey.

三、分析结果

(一) 相关分析结果

图2—图4和表2分别为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控制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这里仅简单解释前者。但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的控制变量与六个因变量之间都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图2展示的是三国四地与亲子同住及实际支持之间的关系。它们在这五个指标上存在明显差别:台湾地区拥有最高的亲子同住比例、子女照顾父母及父母照顾子女的比例,表明转型时期的台湾地区依旧维系着较强的亲子互动。出人意料的是,在四地中,中国大陆父母对子女非经济支持的比例是最低的,经济支持也仅略高于台湾地区。一般认为亲代对子代的支持在中国大陆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因为在城市有大量的“啃老族”,即便一些农村父母经济上没有能力支持子女,但他们往往提供日常照料支持(如照料孙子女)。不过,中国大陆偏低的亲子支持主要是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绝对比例(尤其是非经济支持)并不低。而其偏低的经济支持可能主要与父母的经济实力有关:绝大多数父母缺乏公共福利保障,即便他们希望给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也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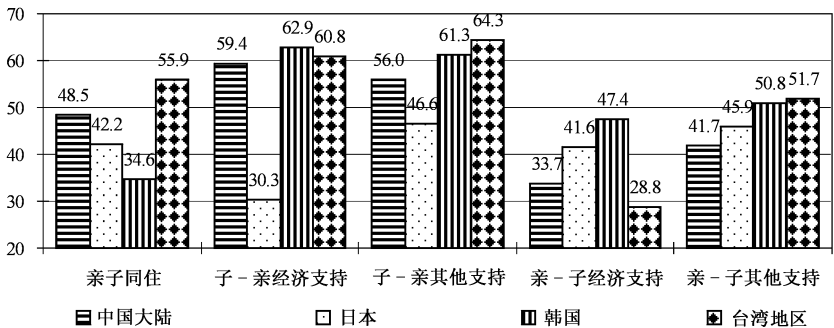


图2 国家/地区因素与亲子同住、实际支持的相关分析结果(单位:百分比)

图3描述了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与四个代际支持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该图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子女对父母的支持与父母对子

女的支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经济支持尤其如此。其二, 与其他支持相比, 经济支持受空间距离的影响较小。(1)就经济支持来看, 除同住的以外, 子女支持父母的比例几乎是父母支持子女的两倍; 且无论亲子是相隔千里, 还是同住一个屋檐下, 子女的经济支持几乎完全不受距离的影响; 但是, 在亲子同住的情况下, 父母支持子女的比例约超过不同住的一倍, 同住大大促进了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其余三种居住模式在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方面的差别甚微。一种可能是, 父母与子女同住, 得到子女的照料, 父母反过来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 比起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不受空间距离所限的情况, 距离对于父母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付有一定影响。(2)就其他支持而言, 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与生活照料等非经济支持的关系几乎是线性的: 距离越远, 提供日常照料的比例越低, 父母对子女的照顾更是如此。这说明, 由于身体、能力等客观条件的制约, 父母只能照顾就近的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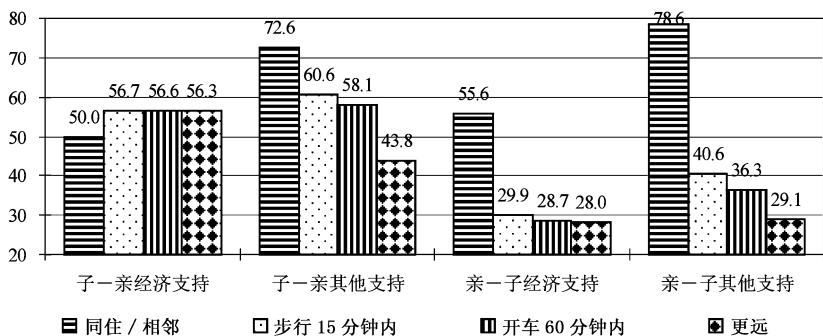


图3 居住模式与代际支持的相关分析结果(单位: 百分比)

亲子情感联络也因地区、居住模式而异(图4)。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受访者与父母联系最频繁, 日本的最稀少。与父母的情感联络频度随亲子的空间距离而减少, 二者几乎呈线性关系。

描述性分析结果清楚显示, 所有六个因变量的确因国家/地区而异; 情感联络、代际支持也因居住模式而不同。然而, 上述关系不是独立的, 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或调节, 因为如表2所示, 本文考察的控制变量也与因变量显著相关。为探讨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独立关系, 下面对数据进行模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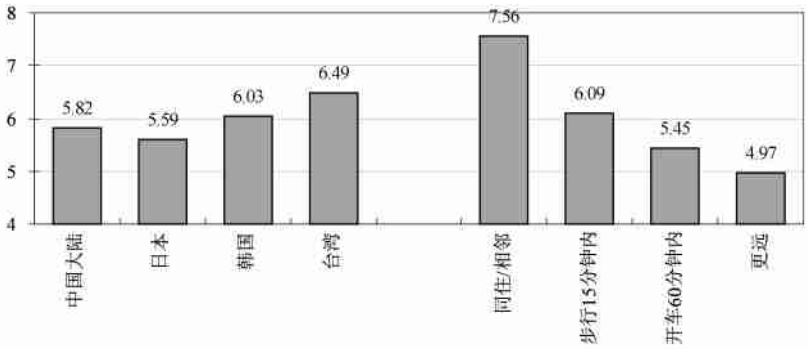


图 4 国家/地区因素、居住模式与情感联络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单位: 频度)

表 2 因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关系(%)

	亲子 同住	情感 联络	子—亲 经济支持	子—亲 其他支持	亲—子 经济支持	亲—子 其他支持
个体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						
年龄						
17—34 岁	69.90	6.50	49.77	61.52	54.54	67.35
35—54 岁	30.09	5.65	59.29	54.51	25.63	34.94
55 岁及以上	26.16	5.37	50.00	51.16	15.31	16.47
女性						
否	52.07	6.30	58.34	58.08	38.07	53.39
是	41.46	5.70	51.09	56.20	35.65	41.14
单身						
否	30.42	5.56	57.45	53.25	26.92	35.39
是	89.45	7.11	63.57	77.75	46.15	67.51
独子						
否	42.73	5.87	55.45	56.85	34.19	43.68
是	69.02	6.68	47.63	58.32	53.22	66.10
兄弟数量						
没有	62.96	6.45	46.13	58.96	52.44	60.38
一个	48.68	6.03	53.57	57.58	39.25	51.01
两个	33.91	5.66	59.38	57.12	26.53	36.25
三个及以上	30.41	5.51	63.29	52.04	18.67	27.69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33.28	5.29	53.90	48.21	16.72	26.62
初中	42.92	5.85	55.66	54.70	31.43	41.72
高中	55.94	6.26	49.56	65.24	49.22	57.91
大学及以上	47.89	6.21	58.11	56.70	41.82	53.00

续表 2

	亲子 同住	情感 联络	子—亲 经济支持	子—亲 其他支持	亲—子 经济支持	亲—子 其他支持
工作状况						
全职	45.54	5.97	62.49	57.17	32.72	48.08
半职	47.21	5.82	39.96	56.32	47.77	46.28
自雇	43.00	5.86	63.66	53.39	24.83	40.41
家务	19.02	5.25	48.15	52.53	29.80	30.81
其他	67.61	6.64	35.03	63.65	57.36	58.88
个体家庭观念与态度						
希望三代同住						
否	41.10	5.86	51.85	53.04	—	—
是	49.71	6.06	56.12	59.53	—	—
子女应该支持父母						
同意	47.73	6.05	58.80	59.82	38.34	48.31
无所谓	43.84	5.85	42.93	53.26	35.33	45.92
不同意	40.48	5.70	45.10	44.36	27.36	36.97
父母特征						
在世情况						
父母均在	52.34	6.07	51.49	57.02	44.62	54.24
父亲尚在	36.13	5.73	57.85	58.64	20.68	29.58
母亲尚在	35.01	5.82	60.57	57.05	22.58	33.87
健康较差						
否	48.91	6.05	53.03	56.85	40.02	51.22
是	41.62	5.84	56.94	57.49	30.65	38.39

数据来源: 2006 East Asian General Survey.

(二)模型分析结果

为更好地辨识控制变量对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调节作用,我们首先仅在模型中纳入主要自变量。结果(这里没有列出)表明,在这六个家庭凝聚力指标中,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均与中国大陆存在明显差异,惟一的例外在于,台湾地区与大陆在亲子同住、子女给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一旦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国家/地区对因变量的影响增强,因为系数的取值增大了(见表3)。这表明,某些控制变量与地区之间存在正向互动。下面,我们按照变量和类别陈述模型的主要分析结果。

(1)国家/地区

模型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日本和韩国的受访者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显著低于中国大陆的受访者,但台湾地区与大

表 3 东亚三国四地亲子之间凝聚力模型分析结果

	亲子同住		情感联络		子_亲经济支持		子_亲其他支持		亲_子经济支持		亲_子其他支持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主要自变量												
国家或地区 (中国大陆 = 参照组)												
日本	-.38***	.10	-.42***	.05	-1.15***	.09	-.44***	.09	.51***	.10	.52***	.10
韩国	-1.22***	.11	.33***	.05	.38***	.09	.34***	.09	.58***	.10	.71***	.10
台湾地区	-.17	.10	.20***	.05	.38***	.09	.23**	.09	-.75***	.10	.26**	.10
亲子空间距离												
同住或邻居 (= 参照组)												
步行 15 分钟内	-	-	-1.20***	.06	-.17	.11	-.52***	.11	-.32***	.11	-1.09***	.11
开车一小时	-	-	-1.88***	.06	-.13	.10	-.66***	.10	-.45***	.10	-1.34***	.10
更远	-	-	-2.42***	.05	-.15	.08	-1.28***	.08	-.70***	.09	-1.86***	.09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年龄 (17-34 岁 = 参照组)												
35-54 岁	-.90***	.10	-.05	.05	.02	.09	-.17	.09	-.12	.10	-.22*	.09
55 岁及以上	-1.12***	.18	-.18	.10	-.01	.17	-.25	.16	-.30	.20	-.72***	.19
女性	-.10	.08	-.29***	.04	-.30***	.07	.03	.06	-.03	.07	-.36***	.07

续表 3

	亲子同住		情感联结		子_亲经济支持		子_亲其他支持		亲_子经济支持		亲_子其他支持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单身	.2,69***	.08	.18**	.06	-.17	.10	.17	.10	.40***	.10	.20*	.10
独子	.35*	.16	-.16*	.08	-.34**	.13	-.23	.13	-.04	.14	-.04	.15
兄弟数量												
一个	-.13***	.12	-.13***	.04	.14	.08	.02	.07	-.25***	.08	-.05	.08
两个	-.64***	.10	-.27***	.05	.13	.09	.00	.09	-.30***	.10	-.19*	.10
三个及以上	-.58***	.12	-.36***	.06	.11	.11	-.27*	.11	-.46***	.12	-.23*	.12
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 = 参照组)												
初中	.29**	.11	.32***	.06	.30**	.10	.27**	.10	.30*	.13	.07	.12
高中	.24	.13	.42***	.07	.09	.11	.56***	.11	.63***	.14	.38**	.13
大学及以上	-.01	.13	.54***	.07	.37**	.12	.33**	.12	.44**	.14	.20	.13
工作状况(在职 = 参照组)												
失业	.22	.12	.05	.06	-.52***	.10	.13	.10	.60***	.11	-.04	.12
自雇	.25**	.10	.09	.05	-.06	.09	-.08	.09	-.02	.10	.06	.10
家务	-.32*	.13	.05	.06	-.46***	.11	.07	.10	.32**	.12	-.02	.12
其他	.60***	.10	.06	.05	-1.25***	.09	-.02	.09	.93***	.09	-.11	.10
个体家庭观念与态度												
希望三代同住	.53***	.07	.08*	.04	.17**	.06	.29***	.06	-.	-.	-.	-.

续表 3

	亲子同在		情感联结		子_亲经济支持		子_亲其他支持		亲_子经济支持		亲_子其他支持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子女应得支持父母												
同意 (参照组)	-	-	-	-	-	.08	-.18*	.07	-	-	-	-
无所谓	-	-	-	-	-	.10	-.57***	.10	-	-	-	-
不同意	-	-	-	-	-	.10	-.57***	.10	-	-	-	-
父母特征												
年龄	-.01	.01	.00	.00	.02***	.00	.02***	.00	-.03***	.01	-.04***	.00
在世情况												
父母均在 (参照组)												
父亲尚在	.06	.14	-.06	.07	.01	.12	.07	.12	-.46**	.14	-.38**	.14
母亲尚在	.24**	.08	.22***	.04	.23**	.08	.15*					
健康较差	.14*	.07	-.08*	.04	.05	.06	.03	.06	-.16*	.07	-.33***	.07
常数	2.18***	.32	7.40***	.17	-.51	.29	.04	.28	2.16***	.32	4.18***	.32
Log likelihood	-2976.86		-	-3612.45		-3732.52		-3147.78		-3128.52		
LR chi2/F test	2042.61		199.56	870.02		557.57		1430.72		1858.92		
Pseudo R2/R2	.28		.45	.11		.07		.19		.23		
N	5789		5789	5789		5789		5789		5789		

数据来源: 2006 East Asian General Survey^a

注释: ①情感联结分析结果来自 OLS 模型; 其余结果均来自 logit 模型。

②***p < 0.001; **p < 0.01; * p < 0.05

陆没有显著差异,表明二者在这方面具有较强的同质性。长期以来,中国大陆、韩国和台湾地区一直视亲子同住为理想的居住模式,富裕家庭更实践着多代同住的习惯。虽然过去30年的社会变迁和经济转轨改变了很多传统和理念,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依旧维系着这一传统。当然,同住也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是经济制约的结果。

在情感联络方面,从系数性质和取值判断,韩国受访者与父母联系最多,次为台湾地区,再次为中国大陆,日本居最后。这是否表明日本亲子之间的联系最弱,韩国的亲子关系最强尚有待进一步论证,其代表性和普遍性也需仔细斟酌,但数据的分析结果的确显示出了这一特点。

三国四地与亲子支持之间的关系比前述关系略显复杂,因为它包括四个指标,更直接、更明显地涉及亲子之间的互动和互惠。结果是,不同的支持指标因国家和地区而显现出差异。与中国大陆相比,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子女对父母的支持超过中国大陆——无论是经济支持还是其他方面的照料,日本子女对父母的支持度是最低的;然而,父母对子女的支持却表现出不同特征:在这四地之中,韩国父母给子女提供经济和非经济支持依然是最多的,日本父母对子女的经济和照料支持也显著超过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却是最少的。

(2) 居住模式

如同预期的一样,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的确是情感联络的重要决定因素,距离越近越可能推动亲子联系。虽然距离不影响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但距离的拉大降低了子女与父母的相互照料和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且其影响几乎是线性的。不过,距离对亲—子、子—亲经济支持影响的差异值得进一步探究。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子女经济支持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肩负赡养父母的义务和责任。父母对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却不然,如果他们与子女同住或邻近居住,父母可能提供补贴。相反,如果子女远离父母,可能是外出工作,这暗示着他们可能拥有更好的收入来源,从而降低了对父母经济支持的需要。

(3) 个体人口特征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除主要变量外,多个维度的家庭凝聚力因控制变量特点的不同而异。若将所有因变量一起考察,我们发现,子女的年龄仅与亲子同住、父母对子女的非经济支持相关:子女的年龄越大,他们与父母同住、获得父母照料支持的可能性越低;但年龄对其他因变

量缺乏显著影响,即不同年龄队列的子女在与父母的情感联络、对父母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方面并无差异。这些结果与预期的基本一致,因为无论子女年龄有多大,他们都会保持与父母的情感联系,并负有支持父母的责任;但随着年岁的增加,他们自己的孩子逐渐长大成人,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会降低接受父母支持及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

性别与某些因变量的关系值得注意:虽然与儿子相比,女儿与父母的情感联络、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得到父母的照料方面概率都显著偏低,但在与父母同住、照料父母及接受父母的经济支持方面,儿、女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女儿在照料父母方面还要超过儿子。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是对传统的背离:在低生育率环境下,许多父母没有儿子,谁将承担照料父母的责任成为社会和家庭共同关注的问题。

如同预期的一样,单身子女与父母同住、联络父母、接受父母支持的可能性均大于曾婚者(包括目前在婚和曾经结过婚但已经离异、分居或丧偶的受访者):他们与父母同住的概率是曾婚者的14倍,使其成为这六个模型中最强的预测变量。

出乎意料的是,虽然独生儿子(但可能有姐妹)与父母同住的概率高于有兄弟的受访者,但他们却不比非独生子女保持与父母更经常的情感联络,给父母提供的经济和其他支持的可能性也较低。该发现与现存其他研究(Knodel et al., 2000; Zimmer & Kwong, 2003)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差异。的确,老年人生活保障的最根本差别在于是否拥有子女,从无到有具有突出的门槛效应(郭志刚, 2002; Yang, 2009),而其中更重要的是有儿子与无儿子的差别(Knodel et al., 2000)。独生儿子往往是父母精神安慰的最主要来源(即便不是惟一来源),他们需要经常与父母保持情感联系,提供必须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这是他们的义务,因为没有兄弟可以分担。然而,分析结果却与理论预期存在较大分歧。我们的初步理解是,只有一个儿子的父母可能有更多的女儿,女儿分担了照料父母的责任。而兄弟数量的增加与同住、情感联络、父母对子女的支持之间的联系是负向的。将两个变量的分析结果联合考察,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在家庭变迁的情况下,子女的性别在父母老年生活方面作用的差异在降低。

(4) 个体社会经济特征

教育与亲子同住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初中和高中教育提高亲子同住的概率,文盲和大学教育却降低其可能性,因为它直接与职业的

向上流动及地域流动有关。教育对情感联络和代际支持的影响是正向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与父母的联系就越多,也越可能支持父母或接受父母的支持。这些正向关系与现代化理论的预测不完全吻合。虽然教育程度与亲子同住呈负关联,但教育程度越高(尤其是大学教育),子女拥有更大的实力与父母保持情感联络、提供经济及非经济支持。同样,对于有能力给子女提供更好教育的父母来说,他们也可能有更强的能力支持子女,二者形成良性互动。这暗示着,代际互动可能更好地表现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中。事实上,从系数的数值判断,子女对父母的支持与父母对子女的支持在教育变量上几乎是相同的,且仅在该变量是相同的。换言之,当子女有能力支持父母时,父母可能也有能力进行互惠。

工作状况比教育复杂,对因变量的影响各不相同。与从事(受雇)全职工作相比,从事自雇工作和其他类别(包括学生、失业、残疾等)更可能与父母同住,而家务劳动更不可能与父母同住。但半职工作与全职工作的差异不明显。可能的解释是,从事自雇工作和其他类别的人群拥有比较弹性的工作时间,同时其他类别人群可能缺乏稳定和较高的收入,部分人可能更需要父母的支持,从而更可能与父母同住。不过,亲子联系与工作状况无显著关联,表明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络并不受制于工作状况。工作状况对经济支持的力度大于对非经济支持的力度,但对子女经济支持父母的影响与父母经济支持子女的影响完全相反:全职工作增强子女经济支持父母的可能性,虽然与自雇工作之差别并不显著;相反,父母给全职子女或自雇者子女的经济支持较少。该结果进一步证实,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更多地取决于子女的需求,因为半职工作、家务、其他工作状况都暗示较低的收入。

(5) 个体的家庭观念

三代居住意愿和支持父母的态度等对因变量产生很强的影响,它们对因变量的正向作用可以被解释为观念和行為对传统的遵循,表明保持着更强家庭观念的受访者更可能实践家庭团结。

(6) 父母特征

模型结果表明,亲子同住和情感联络均与年轻父母的年龄无显著关联,但亲子支持却不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父母年岁的增长促使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父母年龄与不同因变量关系的差异性表明,年龄越大,父母经济来源的渠道就越少、他们的健康水

平越差,从而降低他们支持子女的可能性,但增加对子女支持的需求。性别和婚姻状态的复合变量与这些因变量都显著相关:子女更可能与丧偶的母亲同住,与之保持更经常的联络,提供更多的支持,但接受较少的支持。这些发现与现存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父母的健康状况与因变量的关系出乎意料:如果父母中的一方身体欠佳,子女与之情感联络的次数越少;虽然他们更可能提供经济和非经济支持,但其影响在统计学上缺乏显著意义。一种可能性是,身体欠佳的父母往往与子女同住;一旦居住模式得到控制,健康的作用就消失了。

总体而言,父母特征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同于子女特征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差异在于,当利用子女特征预测子女的行为时(即与父母同住、与父母的情感联络、对父母的支持),子女特征的作用明显大于父母特征;反之,在预测父母行为时(即父母对子女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父母特征变得更为重要。

四、总结与思考

过去,由于跨地区比较研究的缺失,我们并不知道在东亚社会这样具有特定历史和传统文化传统的地区中,现代化的变迁是否削弱了通过地缘邻近、情感交流、实际支持来衡量的家庭亲子凝聚力,也不清楚各地区不同程度的社会变迁对亲子凝聚力是否产生相异的作用。2006年东亚社会调查的家庭主题调查数据给我们提供了回答上述问题的可能性。虽然由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有些重要因素因无法匹配而未能纳入模型分析,且因该数据是单个时点的横向数据而不能直接回答变化的问题及因果关系,但它是到目前为止,东亚地区惟一一个可以直接进行比较研究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对该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三点重要结论,分别回答本文的三个研究问题。

首先,尽管东亚四地的社会、经济、人口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家庭凝聚力没有遭到相应破坏,依旧得以延续,代际支持体系仍然正常运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从人们的家庭观念来看,大约三分之二的成年子女有三代同住的意愿,近四分之三子女认为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满足父母需求的责任(请参见表1)。从行为上看,不是所有具有上述意愿和想法的受访者都能言行一致,但其践行的比

例还是较高:约有一半的受访者与父母同住,并与父母保持密切的情感交流,一半以上的受访者给父母提供经济和非经济支持;这些关系不是单向的,父母也表现出类似的互惠行为,虽然其行为更多地受制于亲子距离、且以子女的需求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的相应衰落,代际之间在日常照料、经济支持、情感慰藉等方面的互动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互惠行为反复且经常发生,当亲子的空间距离邻近时更是如此。在父母与子女相隔较远的场合,虽然面对面交流和支持的形式受到影响,但亲子交流和交换以其他的形式进行着。

东亚四个地区的比较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论。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尽管与中国大陆相比,韩国亲子同住的概率偏低,但他们在情感联络、亲子之间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国大陆。除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外,台湾地区也表现出类似特点。若将本文测量的六个指标(尤其是从子女角度衡量的前四个因变量)同时考虑,并根据系数的取值加以判断,我们不难发现,家庭凝聚力在韩国保存最强,台湾地区次之,中国大陆再次,日本最弱;在用来衡量该概念的六个指标的四个指标中,日本的亲子同住、亲子联络、子女对父母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的比例和概率都是最低的,而父母却大量支持子女。在东亚四地中,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绝大部分指标上展现出更多的相似性,这或许是文化同源的结果。该发现仅仅部分地印证了现代化理论——日本最弱支持了现代化的假定,但中国次弱却与预测不符。这进一步表明,现代化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东亚社会家庭凝聚力的变化。

在我们看来,家庭凝聚力是包括经济结构的制约、文化传承和积淀及现代化的力量在内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虽然有些力量的作用是相反的。从现实情况看,代际之间资源的互补性使现代化进程与家庭凝聚力相互兼容。女性的劳动参与,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和冲突,专业机构公共支持和服务的缺失或不足,人们对市场服务或公共服务的不满等因素,都使代际之间在包括时间、服务、经济在内的交换变得十分重要和必要。正是这种重要性和必要性,加上传统文化的传承效应,共同延续着家庭凝聚力。我们的分析证明,不仅工作与家庭的矛盾会对家庭凝聚力产生影响(Hirschman & Minh, 2002; Pimentel & Liu, 2004),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对子女的家庭观念(即三代同住的愿望、对赡养父母的态度)变量的分析,揭示了文化传统对于家庭凝聚力

也具有强烈的影响作用。这些有悖于现代化理论的发现也许是尚在进行的、与现代化相抗衡的维系家庭传统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也许正是延续代际同住、情感联络、实际支持的强大社会压力的折射,致使在社会变革和家庭变迁面前,家庭凝聚力并没有削弱,亲子之间的依赖和依存成功地延续着传统的家庭团结力量。事实证明,家庭凝聚力具有强大的抗逆力性和适应性,深厚的文化积淀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

其次,东亚四地在家庭凝聚力方面表现出很大差异,在不同维度的凝聚力方面也展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虽然东亚三国四地享有类似的人口转变模式及强调代际互惠的文化背景(如:儒家文化体系),但它们在家庭凝聚力方面表现出各自特点,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差异尤为明显,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差异略小。这进一步证实,现代化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当今亲代与子代的家庭行为和亲子凝聚力的情况。我们认为,产生差异的原因除前面提到的结构性制约及文化作用外,也与各地区人口转变的步伐和阶段、政治经济背景等因素直接有关。总体而言,日本的家庭凝聚力最弱,其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慰藉、日常照料和经济支持都很少,然而父母却大量支持子女。该发现表明,日本的代际关系更类似于接力型的西方模式,即代际支持主要从父母流向子女。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在这四个地区中,日本的人口转变发生和完成的时间最早,在二战以后人们自觉地限制生育,其出生率在20世纪50年代初骤然降低,总和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并持续缓慢降低,成为目前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起步很早的人口转变对家庭的影响基本完成,从而使日本家庭形式和观念在部分保持东方特色的同时,也较多地融入了西方元素。二是与日本社会收入对年龄的回报及良好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有关。无论在日常照料、医疗保险,还是在经济生活方面,日本政府都给老年人提供了较为优厚的福利水平,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日常照料亦有所托。一方面,良好的公共支持体系减弱了父母对子女养老的需求,另一方面,相对丰厚的退休金和养老金增强了父母支持子女的实力和能力。相反,日本社会激烈的竞争降低了子女供养父母的能力,却加深了年轻人对父母方方面面的依赖。

近30年来,韩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并没有相应地削弱其家庭凝聚力,它似乎成功地做到了经济上现代化、文化上延续和传承二者的结合。韩国的人口转变起步较晚,且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与计划生育项目密切相关;现代化的发展和家庭的变迁也是

近几十年的事情；深厚和强势的传统文化，使得家庭凝聚力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仍然牢固地保持着。同时，韩国的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障等公共福利制度的建立也是近些年的事情，父母对子女的心理情感依赖和实际依赖都依旧存在，这也进一步维系着传统的延续。

在东亚四地，现代化程度最低、人口转变起步和完成时间最晚、公共福利最差的是中国大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刚刚起步，公共服务水准也相对低下，从而使亲子之间更依赖于代际之间的互动和互惠。从理论上讲，这似应更好地维系家庭凝聚力。然而，中国大陆家庭的凝聚力反而不如韩国和台湾地区牢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使其具有下降的速度过快、（在短时间内生育水平）过低的特点，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家庭规模，也使不少家庭有女无儿，家庭结构人为地遭遇巨大变故。同时，过去20、30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拉大了亲子之间的地域距离，改变了亲子居住模式，并赋予亲子交换模式新的内容和形式，使许多子女在维系家庭凝聚力方面有心无力；又如，近百年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传统的家庭文化和伦理观念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远有五四运动、近有10年“文化大革命”等旨在摒弃传统文化、改变家庭理念的政治事件，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家庭凝聚力；再如，近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跨越跳跃式的，其间也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及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最后，个体的人文资本积淀比较薄弱，且年轻妇女基本都参与社会劳动，故无论是亲代还是子代，维持代际支持的能力受到相应的制约，再次凸显了亲子之间在代际互惠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两难困境。

最后，居住模式与亲子情感联络、代际支持显现出很强的关系，是代际互动和家庭凝聚力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给他们的互动带来一定的阻碍，尤其是面对面的联络和亲历亲为的互惠交流更是如此。距离对子女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没有显著影响，但与父母流向子女的经济支持呈负关联。如前所言，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主要是基于子女的需求及对子女提供非经济支持的一种补充。

虽然本文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推广性有待更多相关研究结果予以支撑，但其发现对未来家庭功能的顺利实施及相应的公共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们注意到，虽然儿子和女儿依旧向父母提供经济和非经济支持，且得到父母的支持，但变化的端倪已经显露，家庭凝聚

力的传统模式也遭遇挑战。人口转变(如: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远距离的人口流动)及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进程等都使亲子同住越来越难以实现:子女居住在父母家庭的比例已经在不断下降(虽然幅度不大),而父母居住于子女家庭的比例却在上升(王跃生,2006),导致了亲子同住比例的相对平衡。在2000年的中国,虽然大部分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与子女同住,但该比例与1990年相比,男性下降了11.4%,女性下降了7.2%(曾毅、王政联,2004)。子女远距离的地域流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使亲子之间的相互照料愈发困难——即便他们都有此意愿,从而使代际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有间”(intimate but distance)。相反,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增加了需要支持的老年人的数量,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使得家庭对公共支持的需求愈发迫切。如何扩展和强化政府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的公共服务功能,建立怎样的公共服务支持体系,设计合适的家庭友好型公共政策,成为迫在眉睫的公共议题。

参考文献:

- 陈皆明,1998,《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郭志刚,2002,《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第1期。
- 王跃生,2006,《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杨菊华,2008,《延续还是变迁?社会经济发展与婚居模式关系研究》,《人口与发展》第5期。
- 曾毅、王政联,2004,《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Bian, F. Q., J. R. Logan & Y. J. Bian 1998,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Proximity, Contact, and Help to Parents.” *Demography* 35.
- Chen, F., S. Short & B. Entwisle 2000, “The Impact of Grandparental Proximity on Maternal Childcare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9.
- Cooney, R. S. & J. Shi 1999, “Household Extens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1987.”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8.
- Davis, D. 1993 “Urban Households: Supplicants to a Socialist State.” In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eds.) by D. Deborah & S. Harre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0, “Re-configuring Shanghai Households.” In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s, and Gender in China*, (eds.) by B. Entwisle & G. Hender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avis-Friedman D. 1991, *Long Lives: 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2n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reedman, R., M. C. Chang & T. H. Sun 1982, “Household Composition, Extended Kinship and Reproduction in Taiwan, 1973–1980.” *Population Studies* 44.

- Goode, W. J. 1963,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 Hirschman, C. & N. H. Minh 2002,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Vietnam Family Structure in the Red River Delt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4.
- Ickels C. 1993, "Settling Accounts: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in an Age of Reform." In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eds.) by D. Davis & S. Harre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nodel, J., J. Friedman, T. S. Anh & B. T. Cuong 2000,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s in Vietnam: Family Size, Sex Composi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Children." *Population Studies* 1.
- Li, J. H. 2004 "Gender Inequality, Family Planning and Maternal and Child Care in a Rural Chinese Count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9.
- Limanonda, B. 1991, "Family Formation in Thailan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arriage and Coresidence." In B. Limanonda & M. Wongsith(eds.), *Report on a Thai Family and Household Survey*. IPS Publication No. 186/91, Bangkok: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 Logan, J., F. Q. Bian & Y. J. Bian 1998,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Chinese Family: The Cas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Social Forces* 76.
- Logan, J. & F. Q. Bian 1999, "Family Values and Coresidence with Married Children in Urban China." *Social Forces* 77(4).
- Landwerlin, G.M. 2001, "Individualization and Family Solidarity: The Case of Spain." Available at <http://www.demogr.mpg.de/Papers/workshops/010623-paper22.pdf>, accessed in April 8, 2008.
- Martin, L. G. 1988 "The Aging of Asia."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43.
- McDonald, Peter 2000, "Gender Equity in Theorie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6.
- Milagros, M., B. Asis, D. Lita, J. Knodel & K. Mehta 1995, "Living Arrangements in Four Asian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0.
- Morgan, S. P. & K. Hiroshima 1983, "The Persistence of Extended Family Residence in Japan: Anachronism or Alternative Strate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 Parish, W. L. & M. K. Whyte 1978,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imentel, E. E. & J. Y. Liu 2004, "Exploring Nonnormative Coresidence in Urban China: Living with Wives' Par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 Silverstein, M., V. L. Bengtson & L. Lawton 1997,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Adult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in 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 Spitz, G. & J. Logan 1990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 Thornton, A. & T. Fricke 1987,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the West, China and South Asia." *Sociological Forum* 2.
- Unger, J. 1993, "Urban Families in the Eighties: An Analysis of Chinese Surveys." In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eds.) by D. Davis & S. Harre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instein, M., T. Sun, M. Chang & R. Freedman 1994, "Co-residence and Other Ties Linking Couples and Their Parents." In A. Thomson & H. Lin (eds.),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in Taiw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hyte, M. & W.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kie, J. R., M. M. Ferree & K. S. Ratcliff 1998, "Gender and Fairness: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Two-earner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0.
- Won, Y. H. & G. R. Lee 1999,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arents in Kore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0.
- Xu, X. H. & S. C. Lai 2004, "Gender Ideologies, Marital Roles and Marital Quality in Taiwa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5.
- Yang, Juhua 2009, "Demographic Transition, Family Change and Elderly Poverty in China, 2002 and 2005."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pril 29-May 2, 2009, Detroit MI.
- Zhao, Z. 2000, "Coresidential Patterns in Historical China: A Simulation Stud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6.
- Zimmer, Z. & J. Kwong 2003, "Family Size and Support of Older Adul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Current Effect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Demography* 1.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
 责任编辑: 谭 深

PAPER

Gift Exchange as an Elementary Form of Religious Life *Ji Zhe* 1

Abstract With his study on gift exchange, Mauss not only transcended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 sacred/society and the profane/individual that haunted Durkheim’s social theory, but also reconciled the desirability and obligation of moral acts and revealed the logics of the foundation and durability of social bonds. In this way, he better answered how society/human nature is possible — a question with which Durkheim’s sociology of religion was primarily concerned. Furthermore, as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s showed, the gift paradigm gives us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irreducible specificity of religion, namely, in Durkheim’s words religion’s “force *sui generis*”. In a sense, Mauss’s *The Gift* could be read as a response to or a rewriting of Durkheim’s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or briefly, gift exchange is an elementary form of religious life.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Family Solidar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inland China, Japan, Korea and Taiwan
 *Yang Juhua & Li Lulu* 26

Abstract: Family solidarity refers to adult child-parent relations and can be examined from structural, social-psychological, and transactional perspectives. In East Asia, the family organization has undergone substantial changes along with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in the past decades and consequently family solidarity may have been affected. Using the 2006 East Asian Social Survey, we develop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family solidarity to compare patterns of adult child-parent relations among Mainland China, Japan, Korea and Taiwan. Analyt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far from eroding, the family organization in East Asia remains strong in coresidence, emotional exchanges and financial support between child and parental generations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in relative strengths in these dimensions of family solidarity across the four societies. Overall, families in Korea seem to maintain the strongest cohesion, followed by those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nd Japanese families are the least cohesive. These results suggest a cultural force that holds the family a solidified system during rising modernization in economy and society.